



漳州港

◆ 李金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漳州港

李金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漳州港：明代海澄月港兴衰史/李金明著. —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. 2001. 8

(福建海港史话)

ISBN 7—211—03623—0

I. 漳… II. 李… III. 港口—交通运输史—福建—漳州市—明代 IV. F55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5786 号

漳州港

ZHANGZHOUANG

李金明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：350001)

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
(泉州市新华路 29 号 邮编：362000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4.625 印张 2 插页 107 千字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

ISBN 7—211—03623—0

F·197 定价：8.1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



前 言

16 世纪下半叶，东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东来的西欧殖民者为了开拓国际市场，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展开激烈竞争：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，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“大帆船贸易”航线；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建立大本营后，为了打开直接对华贸易的大门，不惜动用武力侵占我国的澎湖岛与台湾南部；葡萄牙殖民者则利用留居澳门的优势，经营着对日本、马尼拉和南亚的三角贸易。而此时在中国国内，明朝政府经过“嘉靖倭患”的沉重打击后，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，不得不考虑改变海外贸易政策，有限度地开放海禁，准许私人申请文引出海贸易。漳州月港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应运而生，因此，它一开始就与国际上的贸易接轨，对中国国内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其中如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大量输入墨西哥、秘鲁等地，改变了南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，冲击了南美殖民地和西班牙宗主国的丝织业生产。反之，从南美和日本输入的大量白银亦加速了明朝国内货币经济的转化，影响到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上述情况说明，有关漳州港史的论述，不能仅着眼于国内形势的变化，而应放到世界史的角度去认识，将之与世界海洋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。本书就是以此为宗旨，对漳州月港的崛起、发展、变化、衰落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，希望能从中获取教益，为今日开发海洋经济起到某些借鉴作用。然而，由于我国

史书中有关海外贸易的记载非常零碎，搜集难度较大，而外文资料中殖民者的档案部头既大，文种又多，故容易出现遗漏的现象，加之作者综合分析论述的能力有限，难免有不妥之处，敬请专家、读者不吝指教。

漳州一中特级教师陈自强先生为本书提供了《漳州月港远眺图》和《漳州月港晏海楼》两幅照片，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李金明 1999 年 5 月 20 日

记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

目 录

一	漳州港地理概述	[1]
二	海禁与走私贸易	[6]
	漳泉人的性格	[6]
	寇与商之分	[10]
	倭寇的骚扰	[13]
三	葡萄牙人在漳州沿海一带的活动	[17]
	葡萄牙人来漳州之前的活动	[17]
	葡萄牙人在浯屿、走马溪的活动	[23]
四	海澄设县	[27]
	海防机构的演变	[27]
	海澄设县经过	[29]
五	月港开禁	[35]
	月港部分开禁的原因	[35]
	饷税的征收	[39]
	督饷馆的设置	[47]
六	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	[54]
	海外贸易船与贸易商	[54]
	贸易地点与航线	[60]
	进出口商品	[69]

七	漳州与菲律宾的海上贸易	[76]
	早期福建与菲律宾的关系	[76]
	马尼拉大帆船贸易	[80]
	漳州与菲律宾贸易的发展	[85]
	漳泉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	[91]
八	漳州与日本的海上贸易	[96]
九	荷兰人在漳州一带沿海的骚扰	[102]
	急于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	[102]
	骚扰漳州一带沿海	[105]
	占据台湾以阻止马尼拉贸易	[109]
十	海商反勒索斗争	[115]
	饷税征收的弊端	[115]
	海商反税监高梁的斗争	[119]
十一	月港的衰落及其在海外贸易史上	
	的地位	[124]
	月港衰落的原因	[124]
	月港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	[128]
	参考书目	[134]

一 漳州港地理概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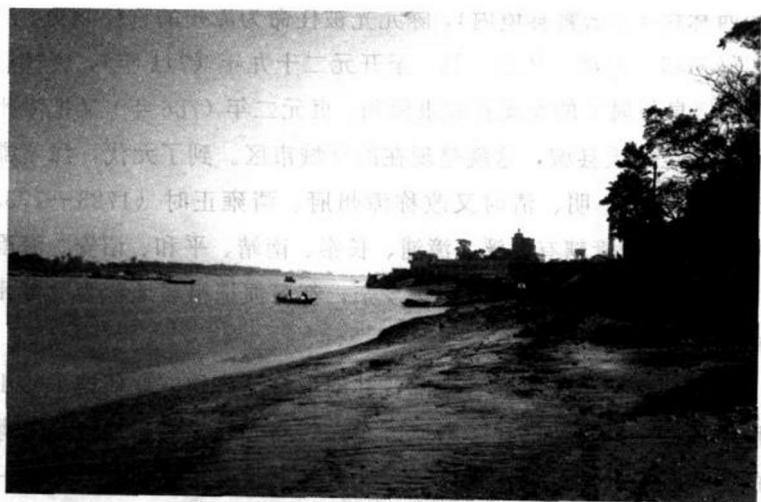
漳南负山枕海，介于闽粤间
一都会也。

——（明）顾炎武

漳州地处闽南九龙江畔园山麓，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。据记载，早在唐代垂拱二年（686年），“开漳圣王”陈元光便奏请武则天批准，在潮州与泉州之间设置一漳州郡，郡城建在漳江畔的西林村（今云霄县境内），陈元光被任命为漳州的首任刺史。漳州最初辖有漳浦、怀恩二县，至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，废怀恩县，把泉州属下的龙溪县改隶漳州。贞元二年（786年）又把漳州治所迁至龙溪县城，这就是现在的芗城市区。到了元代，漳州郡改称漳州路；明、清时又改称漳州府。清雍正时（1723—1735年），漳州府管辖有龙溪、漳浦、长泰、南靖、平和、诏安、海澄七县，故后来移居台湾的漳籍乡亲，都习惯把祖居地称为“漳州府”或“七县”。

漳州地区位于福建省南部，其南濒台湾海峡，北倚博平岭山脉，属闽东南沿海的丘陵平原区。在陆路方面，漳州地区为闽粤的交通枢纽，明代的漳州府，东北通过泉州府、福州府与江浙一带衔接；西北越过博平岭山脉与粤、赣相通；西南通过诏安与广东潮州毗连。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众多

的运输渠道和广阔的腹地。在水路方面，漳州地区境内有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，其发源于闽中大山带南段，正源称北溪，主要支流有西溪和南溪，它们携带的泥沙在下游淤积，形成福建省最大的海积冲积平原——漳州平原。这些溪流在漳州平原东部的龙海县境内相汇入海，其入海口即明代著名的私人海外贸易港——海澄月港。此外，漳州地区其他较长的河流，如漳浦的鹿溪、云霄的漳江、诏安的东溪等，亦在各自的入海口形成优良的港湾，为漳州地区的水上交通提供了方便。在海运方面，漳州地区隔台湾海峡与台湾、琉球对峙，隔南海与东南亚相望，附近的海域在历史上就是我国江、浙、闽地区与东南亚、印度各国进行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必经之地。其沿海一带，北起九龙江口附近的厦门港，南至毗连广东的诏安湾，港汊众多，岛屿星罗棋布，海岸线漫长，在明代海禁期间，是有名的走私贸易活动地点。



漳州月港远眺图

东山县地处中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,东濒台湾海峡,西、南、北面分别与云霄、诏安、漳浦隔海相望。明初洪武二年(1369年),按“凡卫所军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,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,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”的规定,在岛上设立千户所,命名为“铜山”。当时为防御倭寇的入患,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州的烽火门(在福宁州宁德县地方,与浙江之温、台接壤,今霞浦县三沙海中)、兴化的南日(在福清县镇东卫兴化府地方,今莆田市的南日岛)、泉州的浯屿(在泉州府永宁卫同安县地方,今厦门外海的大担岛太武山外)设立三个水寨。后来于景泰年间(1450—1457年)又增设漳州铜山水寨(在漳州府漳浦县镇海卫及玄钟地方,今东山县的东山岛)、福州小埕水寨(在罗源、连江、长乐三县地方,今连江县东北80里的定海)。这五个水寨合称为“五澳”,构成八闽海疆五大古城的重镇。铜山因僻处海岛,孤悬海外,故历来为海外走私贸易商频繁活动之地,天启年间(1621—1627年)曾任同安县令的曹履泰在《靖海纪略》中就谈道:“铜山一带日日有小船,载酒载猪,并绫绸绢缎,交与贼众。”甚至连当地的武弁,为避免与走私贸易商冲突,亦主动予以接济,可见铜山一带的走私活动向来是猖獗异常。

诏安县地处福建省最南端闽粤交界处,东临台湾海峡,与东山岛隔海相望,北和云霄、平和毗邻,西南同广东交界,素有“福建南大门”之称。其走马溪在明初为中外走私贸易商泊船之处,每当三、四月东南风汛时,外国走私船多自粤趋闽,走马溪就是其停泊和交接之所。港内有东澳,为海口藏风之处,凡来往的走私贸易船均停泊于此,故俗称为“贼澳”。嘉靖年间,给事中杜汝楨、参政曹亨、副使方任等人相继进港巡视,于石上镌刻“天视海防”四个大字,以示此地为一海防重地。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,浙福巡抚朱纨曾在此处大破葡萄牙殖民者的走私船只,擒获

海寇商人头目李光头等 96 人，并就地斩首。

月港位于贯穿漳州平原的九龙江下游江海会合处，以其“一水中堦环绕如偃月”而得名。其港口，起自海澄港口，沿海港顺流往东，至海门岛。港口有大泥诸险，又自圭屿以西，有紫泥州，



漳州月港晏海楼

西接乌礁、许茂诸洲，又西北数里即柳营江合诸溪处谓之三叉河。河口谓之澳头，即福河北岸，东抵省会之通道，海舟登泊最易。明初海禁严厉时，月港因“僻处海隅，俗如化外”，而一度成为闻名中外的走私贸易港。至隆庆元年（1567 年），明朝政府宣布在月港

部分开放海禁，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，缴纳饷税，出海到东西洋进行贸易，月港遂成为“海舶鳞集，商贾咸聚”的私人海外贸易港，与汉、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，宋、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，并称为福建历史上的“四大商港”。现在古代月港遗址，尚存有 7 个码头，并在古码头附近出土过古船的大铁锚（今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）。在容川码头旧址，有一道石板路伸入江中，码头以东的港口桥，建于明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 年），桥下仍可见桥墩残垣。容川码头附近的“豆巷”，是当年月港最热闹的贸易集市。至今，百余米的笔直巷道上，街容店貌仍作为古迹按原样保存着。豆巷内有供奉关帝公的“武圣殿”。在港口的东端，有始建于明万历八年（1580 年）的六角柱形四层古军事建筑——晏海楼。据《海澄县志》记载，当年民族英雄戚继光在月港平定倭患时，为加强海防，在海澄县城筑起石城墙，驻兵防守，并建晏海楼、镇远楼，以障海口东北之虚。如今，晏海楼仍巍然屹立。

二 海禁与走私贸易

东南滨海之地，以贩海为生，
其来已久，而闽为甚。闽之福兴
泉漳，襟山带海，田不足耕，非
市舶无以助衣食，其民恬波涛而
轻生死，亦其习使然，而漳为甚。

——（明）许孚远

漳泉人的性格

明初，为防止倭寇骚扰，在沿海一带厉行海禁，禁止人民擅自出海与外国贸易，私下与外国贸易者，必置之重法。在此海禁期间，大凡一切违禁出海的贸易活动均属走私贸易之列。这种走私贸易在漳泉一带不仅屡禁不止，而且愈演愈烈，正如人们所说：“片板不许下海，艤艫巨舰反蔽江而来；寸货不许入番，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。”（谢杰《虔台倭纂》上卷《倭原》）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有如下几方面原因：

首先，与漳泉本地的地理特点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漳泉一带多山少田，濒临大海，居民以海为田，利商舶，轻远游，早在明初就有不少人移居到东南亚各地。如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马欢在《瀛涯胜览》中写道，当时在爪哇东部的杜板，约有千余

家，其间多数是流寓于此的广东人和漳州人。在苏门答腊岛东部的旧港，其居民也多数是从广东和漳泉逃来此地的。至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，海寇商人头目张璉逃到旧港为蕃舶长时，仍有多数漳泉人归附之。有些漳州人在海外还充任外国使臣入明朝贡，如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，爪哇国使臣财富八致满荣，原姓洪，名茂仔，漳州府龙溪县人；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，爪哇国使臣亚烈马用良、通事良殷南文旦，皆是漳州府龙溪县人。他们在入贡期间，分别要求回乡复业或祭祖造祠堂后再回爪哇。

漳泉人这种利商舶、轻远游的性格使之在海禁严厉时，仍为窥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，出海从事走私贸易。正如明人冯璋在《通番舶议》中所说：“泉漳风俗，嗜利通番，今虽重以充军、处死之条，尚犹结党成风，造船出海，私相贸易，恬无畏忌。”就以对日本贸易来说，虽然明政府对之始终实行严禁，但不少漳泉海商还是冒死前往贸易。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十二月，因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，并被解送回国的漳州人就有39人之多。在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据兵部估计，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漳泉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。可见漳泉本地这种以贩洋代农贾的自然条件和惟利是视，恬波涛而轻生死的风俗习惯，使漳泉人养成了强烈的经商欲望，他们“富家征货，固得捆载归来；贫者为佣，亦博升米自给”，必然要冲破海禁牢笼，到海外从事走私贸易。

其次，漳泉海商善于航海，勇于冒险，具有出远洋经商的特质。漳泉人因以海为田，视渊若陵，久而成为习惯，故在东南沿海各省，善于操舟航海者，多数皆漳泉人。明嘉靖时参加平倭的赵文华就说过：谙水道，操舟善斗，皆漳泉人；漳之诏安有梅岭、龙溪、海沧、月港，泉之晋江有安海，船主、喇哈、火头、舵公皆出焉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给事中陈侃奉命到琉球册封时，在

其封舟上长期雇佣的几个人，都是漳州人。陈侃认为：“漳人以海为生，童而习之，至老不休，风涛之惊，见惯浑闲事耳。”在帆船时代，出洋经商者不具备一点冒险精神是不行的，他们涉重洋，冒风飚，航行中惊涛骇浪，险恶莫可名状，全靠老天保佑。数百人聚集在一艘贸易船上，“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宾”，从中推一“豪富者为主，中载重货，余各以己资市物往”，在波峰浪谷中求生存。漳泉海商正是具有这种特质，故使之无视海禁，至海外从事走私贸易成为可能。

第三，漳泉海商善于经营，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。漳泉一带虽不蓄蚕，但丝绸却甚出名，明代时漳州的纱绢与饶州的瓷器、湖州的丝绵、松江的绵布，并称为日本人珍重的四种中国产品。漳泉手工艺人具有惊人的仿造能力，明人何乔远在《闽书》中曾称赞说：“百工技艺，不能为天下先，敏而善仿，北土缁纁，西夷之毳毼，莫不能成。”明代后期，为了迎合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需要，漳泉海商在丝绸织造上大下功夫，巧妙地仿效西班牙流行的图案，做得极端像安达卢西亚花布，并略胜过它。当时的西班牙人博巴迪拉曾评论漳泉海商敏锐的经营头脑说：“这些中国商人是如此敏锐，假如今年某一种商品很畅销，明年他们就将运来一大堆。有一位因某种疾病而失去鼻子的西班牙人，请了一位中国人替他做一个木头鼻子，以便能弥补他脸上的缺陷。这位中国人替他做的鼻子异常之好，这个西班牙人很高兴，慷慨地给了他 20 埃斯库多(escudo, 葡萄牙及智利的货币单位)。这位中国人以为这钱太好赚了，第二年就载运了满满一船的木头鼻子到马尼拉。然而他大失所望，因为如要卖掉这些新货物，就必须把住在菲律宾的全部西班牙人的鼻子都割掉。”这当然是在讲笑话，但从中可看出漳泉海商在经营上是颇具敏锐头脑的，正因为如此，故他们在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厚，以致“舍死趋之如鹜”。